

女师大风潮再议

陆建德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现,原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叙述应该适度调整、改变。清末民初多学潮,每次卷来,照例套用一些响亮的口号。我们的近代史叙述中,“学生”几乎与“进步”“正确”同义,他们为罢课抗议打出的旗号常被史家不加分辨地移植过来,旗号背后的动机大都免检。1925年,鲁迅和一些在女师大兼课的北大教师发布宣言,公开支持许广平等少数激进学生,终于达到了“驱杨倒章”的目的。多年来学界囿于成见,轻信风潮过程中少数学生罗列的杨荫榆的罪状,支持她们的暴烈行为,还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北大浙籍教授在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后如何与新得势的实力派挑战弱势政府,抢夺权力。

[关键词]女师大风潮;鲁迅;易培基;庚子赔款退还款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7.016

《大辞海》第十二卷《中国近现代史卷》中“女师大风潮”词条的前半部分是这样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开展的以驱逐校长杨荫榆为中心的斗争风潮。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不承认压制学生运动的杨荫榆为校长。4月,章士钊强调‘整顿校风’,支持杨荫榆。5月9日,女师大校评议会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11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紧急会议,决定驱逐杨荫榆,同时出

版《驱杨运动特刊》,并将真相诉诸社会。”^[1]风潮来得突然,“真相”究竟如何,还应该重新审视。深深卷入其事的鲁迅后来也表示,当年身处历史的迷雾之中,也会误判。

一、历史的迷雾和消失的校长

1932年12月16日,鲁迅为他与景宋(即许广平)的书信合集《两地书》写序,有意刺激当局的神经:“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

作者简介:陆建德,《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浙江海宁人,1954年生于杭州,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获国家教育部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专业为英国文学。1990年作为达尔文学院的一员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后任该所副所长兼《外国文学动态》主编。2010年调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直至2017年退休。2019年至今任厦门大学讲座教授、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作包括《麻雀啾啾:文学与社会》(1996)、《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2001)、《思想背后的利益》(2005)、《高悬的画布——不带理论的旅行》和《自我的风景》。近年关注中国近代史、现代文学的发生和20世纪20、30年代的北京文教界,著有《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2017)和《戊戌谈话录》(2019)以及系列鲁迅论文。主编《艾略特文集》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

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因此从1927年到1930年,他此前保存的很多信件“大烧毁了两次”。^[2]至于两人之间留下来即将公开发表的信件,鲁迅虽轻描淡写,却仍不免夹带着近三十年前“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心情:“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糊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吃了。”^[3]从师生开始通信的1925年春天到1932年12月,鲁迅目睹国民党执政后的蜕变,作出一系列新的选择,比如1930年2月他在上海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这个团体的宗旨,按照《鲁迅全集》的注释,“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4]也许,天下大事出于偶然者多,总是不可凭借所谓的铁律来预测。

米兰·昆德拉也曾否定后见之明,鲁迅所说的“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是所有人都难以避免的状况:

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是人类永恒生存状态的一部分。

不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前进道路上的迷雾,就是忘记了人是什么,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5]

可以推断,鲁迅所反省的“欢欣鼓舞之词”,并不是全部出现在他编定的《两地书》中。1925年,他和北大马裕藻、沈尹默等在女子师范大学兼课的浙籍教授与教育总长章士钊、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以及已无兵权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形成尖锐对立之势,冲锋于前,并不是以小博大。他们的后援势力强大,包括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和接替章士钊、杨荫榆当上教长和女师大校长的易培基。然而,这两个名字一度不见于关于鲁迅与女师大学潮的叙述。

诚如陈漱渝先生所言:“研究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的关系,是了解鲁迅生平,学习鲁迅作

品,分析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6]以许广平为代表的激进学生“驱杨倒章”成功,女师大如愿迎来了新的校长。1926年1月10日,鲁迅出席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最后一次会议,他是该会成员。会议议决:自女师大新校长就职之日,校务维持会即自行解散。三天后,新校长易培基就任并莅临欢迎会。鲁迅、许寿裳和许广平都登台发表即兴演说,易培基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他们的致辞中。陈漱渝先生提到这次欢迎会,还部分引用了鲁迅、许广平的讲话,但是大会主角却未能在书中露面:

一月十三日,新校长到任,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发表讲话。他说:“回忆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共有半年。其间仍然开学,上课,以至恢复校址。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但是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而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7]

引文中出现四个省略号,读者要检索略去的文字并不难,然而长期以来这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却被忽略了。1926年年初《女师大周刊》第一一八期载有《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欢迎词》的原文(标下划线部分为陈著所删去的内容):

回忆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其间仍然开学,上课,以至恢复校址。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并且希望有新校长到校,得以将这重大的责任交出。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而且依了大家的公意,任命本校的教育维持会正主席易先生为校长了。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

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但是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为什么呢?先经说过,因为易先生是本校全体所希望的校长,而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8]

鲁迅这次演讲,通篇是“欢欣鼓舞之词”。为什么《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的作者或出版社让“易先生”隐身而去?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经高人指点发动“北京政变”,故宫易手,万众瞩目的文物清点工作由号称京城无冕之王的李石曾主持,合法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不得不当看客,非常尴尬。此时易培基现身于权力前台。第二年春天开始逐渐激化的“驱杨倒章”运动,除了杨章二人“思想保守”之过,是不是为了给他腾出官位?易言之,事件的真实起因也可能由结局而渐趋明朗。果真如此,那就有点不堪回首了。《两地书》面世(1933年4月)前不久,鲁迅撰文讽刺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馆长时一些可疑举措,如古物南运。稍后“故宫盗宝案”事发,易培基声誉扫地,国民党政府检察部门排除政界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和张静江的干扰,改组故宫领导层,立案调查。鲁迅逝世前夕,不利于易培基和他女婿、故宫博物馆秘书长李宗侗(李石曾之侄)的证据日渐增多。而早在1925年3月,李宗侗和徐旭生一起在北京创办《猛进》周刊,却与鲁迅和北大浙籍教授互相配合,结成“驱杨倒章”的联盟。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建都南京,李宗侗处处兼职,报酬之丰厚令人咋舌,昔日北洋政府的批评者领略到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标榜的政党掌权后堕落腐

败的速度,鲁迅与新贵们也渐渐疏远,公开讽刺古物南运,已不屑维持往年与易培基和李宗侗的情谊。当检察院1937年开庭审理“故宫盗宝案”时,被告易培基竟从人间蒸发。当时可敬的新闻从业人员对他的行踪时有报道,无奈国民党当局处于战时多方掣肘下无力执法,以致此案在抗战胜利后不了了之。^[9]易培基和李石曾对故宫实行家族化管理,早在1924年秋的“北京政变”时期就可能已经暗中预谋,夺取女师大校长职位,仅仅是通盘夺权规划里一个小小的环节。

二、民气、民力与发起风潮的动机

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后,北京学生发起抗议英、日的运动,有的势力自然希望藉此羞辱、颠覆政府。^[10]鲁迅同情学生,但是他却觉察出示威游行之类的“爱国运动”不是正道。他说到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顺天时报》时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从来就不大看这报,但也并非“排外”,实在因为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11]

1923年3月10日,北洋政府向日本提出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14日被拒,北京随即爆发学生抗议活动。弱国无外交,这是常识。学生上街,固然出于爱国热诚,但是当时的南方政权也希图占领舆论制高点,暗中鼓动学

生逼迫北京政府采取力不能及的强硬措施,而已方可以从容得利。1925年4月4日,《顺天时报》发表社论《爱国的两说与爱国的两派》,其中说:“凡一国中兴之际,照例发生充实民力论及伸张国权论两派。试就中国之现状而论,亦明明有此二说可观。……国权论者常多为感情所支配。……民力论者多具理智之头脑。……故国权论者,可以投好广漠之爱国心。民力论者,必为多数人所不悦。于是高倡国权论容易,主张民力论甚难。”^[12]

这些文字转引自鲁迅的《忽然想到·十》(作于1925年6月11日)。短文最后一段将时局与北京学界联系起来:“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13]“表面的宣传”不足道,呼同类中意见不合者“国贼”“洋奴”,也是博取庸众喝彩的廉价手法。诸如此类的习惯要慢慢改革,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过,这里说的“巧人”又是指谁呢?

过了不久,鲁迅又讲到玄虚飘渺的民气:“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14]鲁迅目力锐利,一眼看出“民气”和“复古”是一对搭档的兄弟。

清末民初多学潮,每次卷来,照例套用“爱国”的响亮口号,也是以鼓动“民气”为己任的。我们的近代史叙述中,“学生”和“青年”两个词几乎与“进步”“正确”同义,他们为罢课抗议打出的旗号常被史家不加分辨地移植过来,旗号背后的动机大都免检。以蔡元培之语,当时的学生自身也带着“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15]进

大学图的是升官发财,无心于学问。学潮有着因时而异的多种原因。每当校方准备严格考试制度或实行入学资格审查,学生往往大闹,可见心虚。政府遇到外交困难,学生中有些人就罢课捣乱。胡适还得为荒废学业的鼓动家们设计补课方案。^[16]另外,学生也是千百年来的檄文(大字报前身)传统熏染出来的,惯于给校方或得罪了他们的教师罗织罪名,再戴上一顶应时的“政治不正确”帽子,比方闻一多1932年春夏之交就在新创办不久的国立青岛大学(当年秋天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曾被称为“法西斯分子”,^[17]结果整饬校风的一个个方案经常碰壁。笔者曾在《学潮的漩涡》一文中梳理过几个典型事例,略说学生方面的散漫和霸道,再将叙述转向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18]郭沫若忆及自己如何与老师缠斗时碰触了自己不那么光明的内心活动,然而许广平在学潮中的暴烈行为却因鲁迅的神化而被标举为斗争精神的典范。许广平大户人家出身,幼年时受到过心理伤害,竟至于对自己的母亲毫无亲情。她又从传统文化沾染了一点所谓的“侠气”,一旦在女师大受到一点常见于英美女校的纪律约束,加之杨荫榆的母亲形象,就会以决绝的方式反叛。但是以她为代表的一小批暴烈女生占领女师大校园,不让校长进校办公,主要还是受到在京城广有影响力的浙籍教授和李石曾、易培基等人的指使。风潮初起时,杨荫榆特意拜访北大浙籍教授中年资最深的马裕藻,她也明白,女师大如果聘用专任教师,来自北大的代课教师必定会让她难堪。此行不可能挽回局势。假如与她教育背景类似、比她年轻一些的苏籍女性教育家吴贻芳、俞庆棠处在她的职位上,将会碰到同样的敌意。后来笔者又将目光投向“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国民党方面的一系列动作,深有感触。1926年3月18日上午的抗议集会,是女师大学潮的延续。笔者在论及保路运动时说过:“群众性示威运动的主使者为了激化矛盾,抢占道德制高点,经常乐见手下的人伤亡。”^[19]“三一八”那天,示威活动组织者是否也

存有这样的念头？为什么《现代评论》在谴责临时政府卫队的同时也追责将学生推向危险的某些势力？

三、庚子赔款退还款与文教界的纷争

随着阅读范围扩大，笔者越来越感到，20世纪20、30年代的北京文教界多纠纷，源头也与“饭碗”问题和有关国家庚子赔款退还款的支配权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部分国家准备效法美国，将未付的赔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与中国相关人士共同设立管理机构。这是20世纪20年代国内教育界关心的头等大事。当时的教育部、大学连薪水也发不出，欠薪成为常态，庚款退还款数目巨大，可以救急，大家引颈而望。北京教育界早在1919年就以“索薪”的名义争夺庚子赔款退还款，闹得满城风雨。^[20]但是这种或明或暗的争夺是不是反映于鲁迅的作品以及鲁迅对文教界某些人士（尤其是以英美留学生为主的“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某些杂志（如《现代评论》）的态度，现代文学研究界还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

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下每一笔收入，他对有形无形的利益始终十分敏感。1929年6月19日夜，他提笔写信给李霁野，两次提到“款子”。他先说南洋一家文具店可以代售书籍，“款子是靠得住的”。接下来的一句话耐人寻味：“长虹和培良大闹，争做首领，可见大概是有了一宗款子了（大约目下还不至于）。希留心他们的暗算。”^[21]高长虹和向培良曾与鲁迅密切来往，这倒并不重要。应该引起读者注意的是鲁迅对他们之间矛盾起因的猜测。“大闹”的主因或许是“有了一宗款子”，不过，两人“争做首领”，总会找出体面的理由来，不会公开为了“款子”相斗。庚子赔款退还款在20世纪20年代是天文数字，鲁迅暗中紧紧留意，符合他的习惯。^[22]

不妨先看一看庚子赔款各国分配率：庚子赔款共计关平银4.5亿两，39年还清，年息4分，本息合计近10亿两（982238150.05两）。各国分

配率以俄国最高，正本数1.3亿两，本息总计近2.85亿两，占赔款总额的28.97%。其余受赔国在赔款总量中所占比重分别是：德国20.02%，法国15.75%，英国11.25%，日本7.73%，美国7.32%，意大利5.92%，比利时1.89%，奥匈帝国0.89%，荷兰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国加起来仅0.06%。赔款中另有“杂项”，比重为0.03%。1917年8月中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23]北洋政府中止对两国的赔付，这样法国份额就仅次于俄国。

这一笔巨款远未到位，传言就激发了国内教育界的想象和急迫的行动。浙江教育会会长经亨颐1919年5月3日在上海与法学界人士朱隐青“略谈浙江大学事”。第二天（4日），北京学生上街抗议中国外交在凡尔赛和会失败，经亨颐另有隐忧。他在日记中吐露，北京中央政府偏爱首都各大学，浙江应先自谋，一旦筹办浙江大学成功，申请庚款支援的理由就十分充足：“由北站乘早车返杭，抵寓已二时。膳后，访各议员。今日星期，晤者不多。庚子赔款，闻有无条件退还中国自办大学之说，若听中央计划，必不及吾浙。斯时，先自成立，则分得数百万基本金，亦可能之事。倘此案否决，岂不太可惜！故不避嫌疑，无论以余善自谋，不可因此中止。”他回杭州立即与省议员商议此事，次日继续奔忙：“至省议会前，访陈一易，又邀秦吉人来，谈浙江大学事。”^[24]其他各省教育会势必也期待各国退还款能够惠及地方，不过他们的希望基本上是落空了，北京各校最终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经亨颐日记中泄露的这一设想也多少便于今天的读者理解，为什么五四运动后突然出现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李石曾创设北京的中法大学，抢得先手，有了大学之名，才能够分润法国的退还款。经亨颐还停留在空想阶段的时候，李石曾已经赶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1919年6月8日）回到法国，以他创设的法华教育会的名义拜访法国政界人士，并且提交一份如何将中国欠法国的庚款用于教育的方案，客观上协同中国驻法

大使胡惟德推动了法国议会 1921 年议决退还庚款,而动机则是为掌控这笔资金预先谋划。1920 年年初李石曾回到北京,立即在他的根据地西山创设北京中法大学,自任校董事会董事长。^[25]

经过几年国与国之间艰难的谈判协商,庚款退还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1924 年 9 月,管理美国庚款退还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首先在北京成立,一个月后冯玉祥违背民国政府与清廷的协议,将溥仪逐出故宫,临时组织专门委员会接管故宫并启动文物清点工程。在纷扰不定的大环境下,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分别于 1924 年 11 月、1925 年 4 月匆匆成立。由于俄国和法国的庚款份额分别是美国的四倍和两倍,这两个委员会的财源应该远比中基会充足,但是使用的效果如何?这也是笔者颇想跟踪调查一番的,结果大为失望。相比较而言,中基会的章程和运作可谓率先垂范,每一笔拨款都按程序讨论通过,记录在案。中基会有的捐助项目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比如早在 1909 年 9 月由缪荃孙受聘创办的国立京师图书馆规模太小,跟不上民国建立后学术发展的步伐,1925 年 10 月 23 日,章士钊主持下的教育部与中基会协商,决定合办一所新的国立图书馆。同年 12 月 2 日,梁启超和李四光被聘为图书馆正副馆长。由于中央政府国库空虚,图书馆费用改由中基会独立承担,馆名也改为北京图书馆。^[26]

鲁迅此前熟悉京师图书馆的馆务,对新的国立图书馆馆长的任命必然关切。李四光在女师大学潮高峰时期公然为杨荫榆抱不平,^[27]现在又到国立图书馆任副职,鲁迅照他的脾性当然是会发声的,不过主要的打击目标还是中基会。1926 年 1 月 18 日,《语丝》刊出他的《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指出中基会这笔资助的一半用来发放正副馆长的薪水:

“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

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28]

文章发表时章士钊和杨荫榆都已落败,易培基则依托李石曾的势力,先是登上教育总长的宝位,然后又出席了前面提及的女师大新校长欢迎会。“三一八”惨案暂时中断了李石曾和易培基的宏大计划,南京政府成立后,他们在企图进一步把控庚子赔款退还款的同时,还在故宫博物院实行家族式管理,或迟或早丑闻总会曝光。“北京政变”后逊清皇室被驱逐出故宫,随后负责接管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由李石曾担任委员长。鲁迅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作于 1925 年 2 月 6 日,最后一段文字呼吁人们警惕“寇盗”和“奴才”,难道没有弦外之音吗?但是当女师大学潮渐起的时候,鲁迅以及马裕藻等在女师大兼课的浙籍教授还是与京城最有势力的李石曾互相借力了。至于杨荫榆的过错,那就是她 1924 年 3 月初在女师大上任后,颇有聘任本校专职教师之意,这样将伤及北大兼职教授的利益。她还没有任何劣迹可言,沈尹默等人已在密谋如何拆台了。1924 年的钱玄同绝对想不到,九十年后,他曾执教多年的北京大学竟会出版他本不欲示人的日记。那年 4 月 24 日下午,北京沙尘又起,他接到浙籍学生郑奠(字介石、石君)来函,去东四钱粮胡同赴约:

郑介石来柬,赴钱粮——之聚寿堂^[29]晚餐。初不知何事,比往,始知客人止有四人:玄同、尹默、兼士、幼渔是也,为商量保全女高师之饭碗问题,因拟先发制人,与杨为难,真是无聊之极。如此大风,叫人赶来尝此苦!^[30]

“杨”就是新任校长杨荫榆。郑介石(1896—1968)名奠,浙江诸暨人,是钱玄同、黄侃学生,

1920年从北大毕业,留校教预科,也在女高师兼课。席位上的四位客人都是北大国文系浙籍教授,也以兼课老师的身份把持了女高师(1925年改名女师大)国文系。年岁最长的马裕藻(字幼渔)多年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此时兼任女高师国文系主任。“尹默、兼士”即沈氏三兄弟中的“二先生”“三先生”,其中沈尹默最会出主意,号称“鬼谷子”。^[31]北京文教界的浙籍“五马三沈二周”旧学底子深厚,擅长罗织罪名,发布檄文。他们中间的几位代表暗中拟定了“先发制人”的方针,杨荫榆要推动治校的每一个环节,都会阻碍重重。阴谋的轮子一旦启动,希望改革的女校长迟早会被撞倒,甚至像落水狗一般遭到痛打。我们的鲁迅研究界囿于成见,非但忽略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浙籍教授在“北京政变”后如何与李石曾、易培基共同作战,甚至还轻信“驱杨倒章”的檄文中罗列的罪状。^[32]随着更多史料的出现,这种因历史惯性而结成的坚冰已在融化。

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里诸位委员滥用权力,不公布账目,参与中基会事务的江苏教育协会会长黄炎培却常怀惕惕之心,欲以“厚道”两字与同仁相勉。1925年6月2日至4日,他在北京参加中基会会议,与颜惠庆、顾维钧、蒋梦麟、丁文江等人接谈多次。6月5日,他在离京返沪前留书蒋梦麟:

此行得一感想,弟近年常勉子弟厚道以矫薄俗。以今日之思想冲突,权利冲突,机会当前,但求胜利,不顾其他,于不知不觉中于厚道两字日离日远。人心险恶至此,而吾辈尚有三五素心,风雨不已,以为小小朋友之乐,已非打破权利思想者所得而享有,其他一切立身处世更可推想而知。兄之地位,一言一动可以致人于险,而已亦最险。弟力不及兄,然以地点关系,亦有几分类似。甚愿吾辈互以厚道两字相勉,才算不枉做一场朋友。^[33]

黄炎培十分清楚,中基会握有令人羡慕的财权,每议一事,都涉及金钱利益,稍有松懈,私心就会

萌发。中基会这一群体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教界,还是最可信赖的。北伐胜利后,李石曾也图谋插手中基会,因胡适等人的制衡未遂其愿。假如中俄、中法基金会的委员们也发出过自警的声音,笔者将刮目相待。

四、结 语

虽然鲁迅的《寡妇主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等几篇作于1925年和1926年的文章一度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名篇,仅仅从它们的立场来认识当时北京文教界的矛盾和争斗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希望现代文学研究界重视庚款退还款在20世纪20、30年代教育界的巨大影响以及鲁迅在女师大学潮期间如何卷入派系之争,然而绝不愿意动摇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地位。时至今日,“国粹”又追念昔日风光,鲁迅的意义更是不减当年。例如他在1918年11月5日《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三十八》所揭示的“合群的自大”和“爱国的自大”常见于微信等各种带有商业动机的自媒体作品:“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34]鲁迅归纳出这些“爱国的自大家”的五大论调,读来也眼熟,感兴趣者可以自行查阅。鲁迅研究在我国人文学界享有盛誉,笔者从外国文学越界进入这个领域,能被接纳就心怀感激。本文涉及的那段历史疑点丛集,笔者企图以新的视角回到实际上已回不去的现场,难免会有失察或牵强的地方,相信学界同仁定会慷慨启蒙指谬。

注释:

[1]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第十二卷《中国近现代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301页。

[2][3][4]《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6页。

[5][捷克]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囍》,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50-251页。

[6]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页。此书前三稿作于1973年至1974年,第四稿和第五稿完成于1976年12月、1977年3月。

[7]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8-69页。

[8]薛绶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3页。

[9]关于此案详情,可参阅陆建德:《故宫盗宝案中的易培基之死——兼及〈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期。

[10]发生于同一年6月下旬的广州沙基惨案死伤人数多得多,却没有出现针对广东革命政府的游行示威。其中原因,似不必多说。

[11][13][14]《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6、97、108页。

[12]转引自该文注10,《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15]语出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刊载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16]胡适1921年9月25日致蔡元培函:“上周学生已有要求废考试的大会,本周又借山东问题为名,明日起即出外讲演。讲演人数自不必多,但此等人即可借此捣乱。稍一不慎,即难收束。补课只剩两星期,而此两星期中日日有罢课或辍课或捣乱之机会。”潘光哲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第1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印行,2018年,第480页。

[17]详见《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1931年和1932年的记载。

[18]陆建德:《学潮的漩涡》,《书城》2013年第4、5期。

[19]陆建德:《戊戌谈往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106页。

[20]详见许文果:《1919-1920年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论析》,《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1]《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22]王得后先生的《鲁迅教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中的《关于鲁迅财富观的笔记》一文对此论述甚详。

[23]这是有魄力的决定,为中国外交争得有利地位,却受到孙中山的反对。我国报刊杂志2018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时并未充分肯定北洋政府的功绩。

[24]张彬、经晖、林建平编:《经亨颐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4页。1919年浙江组建大学时机未到,许炳堃(1920年继经亨颐任省教育会会长)主持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现浙江大学前身之一)带专科性质。

[25]详见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页。年谱记载,李石曾还在1919年夏从巴黎赴布鲁塞尔,洽商用比利时庚款筹办中比大学,未获成功。李石曾一般会利用蔡元培作挡箭牌,请他担任这些机构的名义上的负责人。

[26]李致忠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国立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学刊》2008年第1期)一文对此论述较详。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将此馆与原国立京师图书馆合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在国家图书馆位于文津街的古籍部原系国立北平图书馆,使用中基会拨款在1931年建成,当时是远东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27]李四光目击少数女师大学生的暴烈行为,写《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刊于《现代评论》,鲁迅已在《“碰壁”之余》回击,嘲笑他为“逍遥自在”的“达人”。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28]《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李四光回应了鲁迅的责难,详见陆建德:《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鲁迅、李四光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29]北京当时著名饭庄之一。

[30]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2页。

[31]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4-415页。

[32]收入王富仁《鲁迅与顾颉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中的《杨荫榆与女师大事件》和《重看杨荫榆事件》两篇文章就是典型的例子。

[33]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34]《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